

阶级民主的工具效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选举动员

王建华

内容提要 苏维埃选举强调民主的阶级性。它通过有无选举权的划分,进行阶级鉴定;通过配合选举的查田运动,来纯洁阶级队伍。强化阶级选举的目的是完成革命的社会动员,在此,组织利益高于一切,个体即便出身贫苦阶级,一旦不遵从组织的要求,就成为阶级异己分子,成为整肃的对象。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当个体政治身份的获得意味着基本权益的让渡时,这种选举式动员的工具效用必然是有限的。

关键词 阶级民主 选举动员 工具效用

王建华,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210023

阶级民主是个体通过阶级身份的认证来享有民主权利。苏维埃选举强调民主的阶级性,是阶级民主的实现形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有三次选举运动。1931年,为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地有了第一次全面的民主选举。因缺少选举经验,次年9月,又进行了一次小规模의 改选运动。1933年8月始,为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总结前两次选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地进行了全面的,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选举运动。就现有研究成果而言,更多的是对民主选举积极作用的肯定。既缺少对文献资料的深入分析,也没有揭示民主选举的真实情况。深入研究这一时期根据地的选举,可以更好地理解阶级民主的工具效用,理解中国式民主的内生逻辑。

一、阶级视域下的民主选举

在马克思主义阶级视域下,“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有产者与无产者即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从维护无产者的阶级利益出发,苏维埃选举是“给一个阶级以民主,给他一阶级以压迫”的武器。把有产者的政权推翻,建立起无产者的政权,把那些靠剥削为生的地主、富农、资本家赶出革命政权^[2],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逻辑。1931年11月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细则》规定,居住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土内的“一切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民,如雇佣劳动者、农民、独立劳动者、城市贫民及他们的家属”,凡年满1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乡村政权建设研究”(13BDJ004),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选举研究”(12JDSZK015),南京大学“985”三期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政治选举研究”(NJU985JD09)的阶段性成果。

二战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民主想象

王艳勤

内容提要 在二战后的民主潮流中,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基于时代的要求,主张“中国型的民主”应当两条腿走路,即政治的民主与经济的民主必须兼得。因此,调和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成为战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在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之间,自由知识分子固然希望一张票与一碗饭兼得,但他们仍然理性地在二者之间进行价值序列的优先性选择;经济民主内部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的关系同样让自由知识分子颇费思量,争论的焦点在于计划社会是否必要。自由知识分子的民主想象凸显了他们的人民立场、建立现代国家的愿望以及从城市到乡村的目光转向,这些特点为他们在历史转折关头所作的选择提供了思想史的注脚。

关键词 政治民主 经济民主 自由知识分子

王艳勤,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430074

1949年,许多自由知识分子选择留在大陆迎接新生的人民政权。在此后若干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他们又积极选择了将自我改造与改造相结合的道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自由知识分子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并不是偶然的,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环境中,在自由主义思想成为一种政治话语的大讨论中,他们的民主思想已经隐约为这种选择提供了注脚。

一、民主有两条腿: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

二战是民主与反民主、民主与法西斯之间的较量,还在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人们就发现,民

主才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在民主的潮流中,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发现,民主有两条腿,即政治的民主与经济的民主,只有当民主的两条腿都能正常行走时,人民的自由、人权才能得到保障。在他们眼里,英美等国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而苏联就是社会主义的代名词,资本主义有政治民主、政治自由而无经济民主、经济平等,社会主义有经济民主、经济平等但无政治民主、政治自由。因此在思考战后重建的计划时,来自社会主义苏联的经济建设经验,使得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经济民主和以政治自由为特征的民主,成为自由知识分子理想中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是否有冲突,是否可以兼得,如何兼得?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1YJC77006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娱乐与革命

——1950—1966 年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刘 宇

内容提要 文化宫是政府举行“宣教仪式”的重要物质载体。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参照苏联模式将文化宫遍设在全国各大中型城市,作为当地的文化娱乐中心,来向当地市民进行动员和宣教。地处首善之区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其功能具有代表性。文章通过探讨文化宫与市民互动交流,各项活动的作用,来勾勒出承载公园与俱乐部双重职能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在建国后 17 年间的运行状态和其中所代表的政治意涵。

关键词 文化宫 北京 娱乐 革命 宣教仪式

刘 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300071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建立于 1950 年,选址在太庙,位于长安街,毗邻天安门,是开展宣传教化和群众娱乐的极佳场所。劳动人民文化宫隶属于北京市总工会,下设宣传科、文艺科、文化休息科、图书馆、人事保卫科、总务科。另外还直接领导“北京市工人俱乐部。”文化宫自成立之日起就披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是政府开展政治宣传和教化的重要阵地。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既有研究,往往注重从描述层面进行探讨,如近期的北京师范大学徐杰的《寓教于乐:1949—1965 年北京城市群众文化生活初探》与华中师范大学戴鸣今的《1949—1966 年武汉市群众文化研究》两篇硕士学位论文,这两篇文章有助于人们了解建国后 17 年间北京与武汉城市群众文化娱乐生活的一些基本情况,其中部分章节涉及到了文化宫所举行的活动;然解释层面上的考察或许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因此,本文将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利用档案、报刊等相关研究材料,以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为个案,试图从政府与民间进行双向互动的视角上来对此进行论述,同时以期对北京文化史的研究贡献一得之见。

一、文化宫的性质及服务对象

天安门东侧,在一片苍松翠柏,紫藤柳绿丛中坐落着几座金瓦红楼,高大雄伟的古建筑,这里就是“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该地的前身是明清两代的皇室家庙,名曰“太庙”,它建于明代永乐十八年(公元 1420 年),是皇家祭祀祖先之地,寻常百姓不能入内。民国时期,由于政权与战乱频仍,无力对此加以修缮和维护,“因而该园内杂草丛生,虫蛇横行,荒芜凋敝”^[1]。解放后,中央政府本着保护古迹文物的目的,对其中建筑进行修整和扩建,初显当年风貌。后经时任总理周恩来提议,政务院批准,将该园辟为

国家权力与基层控制

——以 1940 年代国民政府实施的国民身份证制度为观察点

刘 魁

内容提要 20 世纪 40 年代,国民政府意图倚重身份证的推行,从而达到既能构建现代国家,又能维持地方治安的双重目的。通过国民身份证的实施,国家权力已经扩张到保甲一级,且直接与个人相挂钩。可以说,与过去历届政府相比,南京国民政府将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大幅渗透又更进了一步。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身份证在推行中,其效用不断的遭到减损,而中共的各种应对举措则加速了这一过程。

关键词 国民兵身份证 国民身份证 推行概况 实施效用

刘 魁,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430079

户政作为国家对住户人口进行管理的一项要政,历来被各届政府加以重视。民国时期,中国的户政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其中,普及国民身份证即是南京国民政府试图对基层社会加强控制与管理的典型体现。因而,对国民身份证开展研究^[1],有助于进一步论证国家权力如何通过各种渠道深入社会基层,以及探讨国民政府构建现代国家的努力。本文正是从这一路径出发,对民国年间的国民身份证加以初步的研究。

一、国民身份证的由来

早在隋代,政府为清查隐匿户口,增加赋税收入,于公元 585 年厘定“大索貌阅”,即要求各州县按照户籍上注明的年龄大小,逐户核对编户成员年龄、长相、身体特征等,以便检查住户是否用谎报年龄、诈老诈小的方法逃避承担赋役。如有不实,“里正须

流配远方”,实行以后,国家户口大增,豪强士族相对削弱^[2]。国民党人认为,宗族时代只有族谱可以证明个人身份,但是族谱携带不便^[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实施兵役制度时,许多壮丁在征前尽量逃避,征后大批逃亡,为堵塞兵役制度上的漏洞,遂推行了国民兵身份证,利用保甲组织,详细填载每个国民兵的出身特征,使得壮丁迁入迁出更便于稽查^[4]。

根据《国民兵身份证暂行条例》,身份证由国民兵团团部制发,加盖关防,正证由乡(镇)队部管理,副证加盖队戳及私章,注明日期后交国民兵本人随身保存,以备查验。主要内容涉及国民兵(年满十八岁至四十五岁之役龄男子)出生年月日、家属(父母姓名,不论存歿)、籍贯(本人原来居住之省县区乡<镇>保甲)、面貌(“长方”、“长圆”、“长”、“圆”、“白”、“黄”、“黑”等)、箕斗(自大拇指起数至小指止,依次将图形纹<斗>填○,缺形纹<箕>填入×,例如“左○

沪宁铁路与近代江苏城市空间演变述论

葛玉红

内容提要 城市空间是由人口、建筑、道路、广场、绿化、组织和公共设施等物质要素组成,其形成和发展是多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交通是影响城市空间形态变迁的重要因素。清末,铁路的出现改变了近代中国城市空间格局及分布特点。沪宁铁路是近代中国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线路之一,它的出现对江苏城市的地理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等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深入研究不仅揭示出铁路交通与区域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及规律,也对促进区域城市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沪宁铁路 近代江苏 城市空间 区域

葛玉红,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210023

城市空间是由人口、建筑、道路、广场、绿化、组织、公共设施等物质要素组成,各要素在城市地域的分布和组合创造着城市空间格局,从而形成各种类型的城市空间形态。这些要素分布和变迁的动力机制不尽相同,所以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发展是多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交通是影响城市空间形态变迁的重要因素,交通技术的每一次创新都对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传统交通方式下,中国城市一般是临水而建,数量少,城市空间较小,其功能单一。清末,一种现代化交通工具——铁路来到中国逐渐取代江河成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交通方式,由此带动了沿线城市的发展,改变了近代中国城市空间格局及分布特点。本文主要从

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探讨沪宁铁路出现后对近代江苏城市的地理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进而揭示出铁路交通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

一、沪宁铁路与城市地理空间

城市地理空间是承载城市活动、物质设施、组织机构的空域,其形成发展与城市中物质实体在城市地表上的运动息息相关,而城市发展与交通工具的发展直接有关。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城市的地理空间规模与支配着交通发展水平的技术之间有密切联系,城市的半径等于人在一小时内所能到达的距离。例如,在罗马,当步行行为行路主要手段时,其城市半

本文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末民初沪宁铁路与江苏社会发展问题研究”(11LSD016)、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沪宁铁路对近代江苏城市空间影响的研究”(2013SJB770006)阶段性成果。

清廷剃发易服与明遗民的抗争

孔定芳

内容提要 满洲入关后,厉行剃发易服,在汉族社会激起强烈反抗;有清一代围绕衣冠发式更是衍生出一系列重大历史事变。以现代的观念视之,衣冠发式的更易似乎无关乎江山社稷和王朝兴废,也与人性的尊严和伦理无直接的干系。但是,发生在清代的“关于头发和衣冠的故事”却令人不得不相信:在中国的历史传统里,衣冠发式原有繁复而严峻的意味。观察明遗民对待剃发易服的态度,以及他们为保存故国衣冠发式的种种因应之策,将为我们深刻认识异质文化融合问题提供一个历史显例。

关键词 剃发易服 明遗民 民族文化

孔定芳,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历史系教授 430074

中国历史上,“改正朔,易服色”本王朝鼎革之际新朝宣示正统性的惯常方式,即或入住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亦莫能外。然而,清初之“剃发易服”却引发满、汉文化的剧烈冲突和汉族社会的强烈反抗,不仅严重阻碍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更深刻影响到有清一代满汉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历史进程。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清初的剃发易服及其引发的汉人社会的强烈反抗多有研究,但大多聚焦于汉族普通民众的态度,至于衣冠发式所寓含的民族文化的意义,特别是作为汉文化代言人的明代遗民士人的态度则关注得不够。

一、衣冠发式的满、汉异俗

由于历史渊源和地理环境的差异,满、汉民族形

成了特质和风格迥异的政治体制、经济型态和文化习俗。在文化上,一为渔猎文化,一为农耕文化;前者尚武重力,以“国语骑射”相尚,后者崇文重礼,以诗书礼教相标榜。衣冠发式之制,最先和最直接的造因厥在自然生态和经济生活无疑,然后才延展至审美和礼制等领域。兴起于高寒的东北白山黑水间的满洲,因其地理生态环境,世代“逐水草而居,以射猎为生”^[1],乃典型的渔猎采集与畜牧相兼的经济生活。即使到明正统年间,生产力相对进步的海西和建州女真农业经济虽已然有所发展,但渔猎采集和畜牧依然是重要的经济部门。一般而言,渔猎文化与农耕文化相异而与游牧文化趋同。钱穆曾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对此有独到观察,他说:“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满汉文化整合与明代遗民的变迁”(项目编号:12BZS035)阶段性成果。